

# 《列国岁计政要》与近代西方年鉴译介

牟国义 沈萌激\*

**摘要** 对近代以来的年鉴编译,仅仅从翻译的中文书名去判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对原书的性质、类别缺乏进一步的了解,也会对译本的性质判断产生失误。关于近代我国第一部编译年鉴出现的时间问题,年鉴界普遍持1909年奉天提学司图书科科长谢荫昌辑译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之说。笔者结合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根据最新资料,认为近代西方年鉴编译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75年,以弗雷德里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编辑的1874年英国《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为底本,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译、海盐郑昌棫笔述、江南制造局刊印的《列国岁计政要》,是我国近代编译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并由此开启了近代西方综合性年鉴译介的先河。在《列国岁计政要》的影响下,清末以英国《政治家年鉴》为蓝本编译的年鉴书籍或资料先后出现过四次,以“列国岁计政要”为名展开的编译活动共有三次。《列国岁计政要》的编译助推了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对后来年鉴属性功能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列国岁计政要 政治家年鉴 江南制造局 年鉴史 统计史 西学东渐

近代西学的传入无不经历先翻译借鉴再到消化吸收的过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年鉴,其引进和发展的路径也不例外。年鉴译介是中国年鉴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不仅关系到对年鉴史实整体时段的认知,而且牵涉到中西文化互动过程中年鉴范式的本土选择及其译介属性功能的社会政治转换。梳理西方年鉴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而探寻年鉴传入近代中国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有必要厘清西方年鉴在中国译介的源头及其来龙去脉。

## 一、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编译出版外国年鉴的起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探讨中国年鉴发

---

\* 牟国义,男,四川省长宁县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江苏年鉴》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史、年鉴学;沈萌激,女,江苏省扬州市人,江苏年鉴杂志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年鉴、科学思想史。

展史的文章和论著,普遍将宣统元年(1909年)7月由奉天提学司图书科科员谢荫昌辑译、奉天图书馆发行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界定为最早编译或翻译的年鉴。较早提出这一观点并具有代表性的是王世伟,他认为,《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20世纪中国编纂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部年鉴”,“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曾掀起过一个年鉴编译出版的热潮,《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源头,具有导夫先路之功”<sup>①</sup>。随后,在其《中国早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一文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年鉴,也是第一部翻译年鉴。”<sup>②</sup>致力于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如方厚枢、孙关龙、李维民、肖东发等,在相关研究中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sup>③</sup>其他一些年鉴史研究成果基本沿袭了这一说法。<sup>④</sup>《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被认为是“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开山之作”<sup>⑤</sup>，“我国编译出版国外年鉴的发轫之作”<sup>⑥</sup>。

其实,近代西方年鉴译介活动的历史比我们过去了解的要久远得多。作为西学东渐的有机组成部分,年鉴(Almanac或Yearbook)译介,早已引起国内外其他专家学者的注意。最早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在西学东渐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的是美国学者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他在1967年出版《傅兰雅:一个向19世纪中国传播西方科技的人》(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century China*)一书“附录”中,列出了1876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列国岁计政要》,源于“The Statesman's Yearbook”,即英国《政治家年鉴》。<sup>⑦</sup>此后,国内统计学界特别是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近代统计或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也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部书籍,并就其底本、内容及其翻译出版的意义有所论及。1983年,刘叔鹤在探讨“统计学”一词的由来和西方统计学传入的文章中提到:“清同治光绪年间(约1879—1880年)曾摘要翻译了欧洲部分国家的统计年鉴,称之为‘列国岁计政要’。这种译本仅仅是各国政府统计机构与统计资料的记载,还没有涉及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sup>⑧</sup>首先将我国翻译年鉴的历史提前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约1879—1880年)”,但指出《列国岁计政要》一书系摘要翻译“欧洲部分

① 王世伟:《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年鉴》,《图书馆杂志》1990年第5期。

② 王世伟:《中国早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方厚枢:《中国年鉴出版概况》,中国年鉴研究会编:《中国年鉴概览》,华艺出版社,1993年;孙关龙:《年鉴与地方志的比较研究》,《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6期;李维民、肖东发主编:《中国年鉴概览》(上编),华艺出版社,2003年,第3页;肖东发等著:《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④ 例如,王莉、王军:《中国年鉴史上的两次出版热浅析》,《图书馆学研究》1998年第6期;宋克辉:《沈阳是我国近代统计年鉴诞生的摇篮》,《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6期;运子微:《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6期;王燕亭、刘崇民:《从馆藏民国年鉴看我国早期年鉴的发展》,《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6期;方书生:《近代中国年鉴的特征与启示》,《上海地方志》2017年第4期。

⑤ 范玉玲:《中国年鉴出版历程及发展规律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 张恒彬主编:《国外年鉴选介》,“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⑦ 转引自[美]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0页。

⑧ 刘叔鹤:《我国“统计学”一词的由来和西方统计学的传入》,《统计》1983年第4期。

国家的统计年鉴”而成。1994年,熊月之的专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参考傅兰雅档案资料、贝奈特等人著作,列出《列国岁计政要》一书底本来源为“*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874*”<sup>①</sup>。此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所论及或阐述<sup>②</sup>。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一文专门研究《列国岁计政要》一书。作者从近代统计史的角度,首次全面介绍了近代4个年份“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情况,阐释了其在近代中国统计史上的地位及对近代思想界的影响,并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将从日本转译的‘年鉴’概念来套癸卯《列国岁计政要》,则中国出现中文译本年鉴的时间可追溯至1875年。”<sup>③</sup>

对《列国岁计政要》一书的相关研究,尽管成果较为丰富,但缺乏从年鉴传入史的视角进行专门探讨,而且有关该书的论述大多零散,对其性质内容、刊刻时间等问题也看法各异,即便有个别专文研究,对各个年份的底本来源以及译介源流的交代也并不十分完整、清晰,尤其是对底本情况缺乏深入探究,尚有不少疏漏之处。根据掌握的现有资料,从年鉴译介史角度,可探究译本与底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近代中国年鉴发展产生的影响。

## 二、近代西方年鉴的发展与传入

19世纪是西方年鉴日新月异的世纪,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和信息载体,年鉴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绚丽图景。

在《穷理查年鉴》《老农夫年鉴》等老牌年鉴持续畅销和《基督教年书》《传教士年书》《家庭基督教年历》等一些宗教类年鉴流行的同时,年鉴以其便览性、实用性等特点进一步深入家庭,《日常娱乐和信息年鉴》《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年鉴》《现代旅行的浪漫:冒险年书》《惠特克年鉴》等相继在英国创刊,美国出现了《晚餐年书》《爱书者的年鉴》《养蜂人年鉴》《农村事务和耕耘者插图年鉴》等一批通俗读物。19世纪中期,《世界年鉴》《英国年鉴》《美国年鉴》《波士顿历书》《得克萨斯州年鉴》等一批国际性或国别性、地区性综合年鉴逐步兴起。据英国剑桥大学B. R. 米切尔对1750年以来各国政府的官方统计资料汇编整理研究发现,这一时期,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柏林、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编纂了统计年鉴。<sup>④</sup> 年鉴编纂迅速向各个领域、各个学科拓展,《英国科学和艺术的事实年鉴》《英国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6、539页。

② 例如,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徐多毅、张勇刚:《江南制造局人文社会科学译著底本的考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0期;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高黎平:《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③ 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统计研究》2015年第9期。

④ [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第4版)，“官方资料来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x~xii。

文学和教育》《牛津年鉴》《美国科学发现年鉴》《纽约论坛报年鉴》《美国农业年鉴》等相继出现。在西方年鉴大发展的热潮中,英国《政治家年鉴》应运而生。

英国《政治家年鉴》创刊于1864年,由弗雷德里克·马丁编辑,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至今仍在编辑发行。1864年英国《政治家年鉴》的副标题是“一部关于文明世界的国家和君主国的统计、宗谱和历史的报告”。该书扉页上,用德文引用了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在1830年1月31日说过的一段话:“大家总说,人们通过数据统治着这个世界。而我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数据了解这个世界被统治得怎么样。”显示了编者对统计数据的重视。编者在序言中写道:“《政治家年鉴》旨在弥补英语世界的一项不足,这是15年前由Robert Peel爵士注意到并建议的。报纸的读者们,或者说当今受过教育的人们,一定时常感受到自己需要一本描述国家或城邦的书,或者是一本以各国梗概为内容的传记体的词典。”这本填补这一缺憾的出版物,内容涉及欧洲的所有国家,亚洲、美洲、澳洲的主要国家,包括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统治者和家族、议会和政府、教堂和教育、税收和开支、军队和海军、人口、贸易和商业。编者宣称:“《政治家年鉴》至高无上的原则是摒弃观点而只提供事实。我们不会评价任何形式的政府,也不会将其与其他政治组织进行比较,更不会对国家政治行为的万千特点做出评价。我们不是干巴巴的陈述事实,而是会提供必要的阐释;而评价,是留给当代史的读者和学生们去做出的。”关于资料来源,编者认为“最主要目标是确保事实和数字的多样性的绝对准确”,因此主要采用了官方文件。如果缺少官方文件作为信息来源,补充来源必须是权威书籍、有影响力的报刊和其他可信来源。在后一种情况下,编者列出了参考来源。编者“希望每年的1月1日出版《政治家年鉴》,使其成为一部有关文明世界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完整的信息库”。创刊之初的英国《政治家年鉴》,全书710页,内容分为欧洲国家、欧洲以外的主要国家两大部分,包括当时世界上35个主要国家及其附属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1865年起,卷首增加了下列比较表: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全球人口密度、欧洲的统治家族、欧洲国家政府的成本、欧洲主要国家的公共债务、英国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军队、法国和大不列颠军队的比较实力、1864年法国和英国铁甲海军的比较实力等。1874年版共835页,收录的对照表主要有:欧洲的信仰、主要国家的银行、主要国家的人口密度、全球铁路、全球电报、全球商船队、一个时代的英国航运发展、1872年和1873年的英国进口市场、1872年和1873年的英国出口市场、主要国家的国债。内容仍分为两个部分,不过名称改为了第一部分欧洲和第二部分美洲、非洲、亚洲和澳洲,内容增加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书是献给政治家和商人的一部包含大量国别比较资料内容的国际性综合年鉴。

19世纪初,这种在西方广为流行的年鉴年刊并不为中国人所知。<sup>①</sup>随着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便览性、实用性的西方年鉴才在中国初露端倪。19世纪20年代,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首先将西方“Almanac”的概念引入中国。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

<sup>①</sup> [美]裨治文:“Chinese Almanacs”,《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6年第1期。

文通过《中国丛报》陆续介绍了当时外国的一些年鉴内容。19世纪40至50年代,由外国传教士等仿效西方便览性年鉴编纂的一批通书开始在通商口岸出现。19世纪60年代,海关总税务司开始定期编辑印行《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这一时期,年鉴译介或编纂由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主导,中国几乎没有人参与其中。在语言运用上,除一些基于传教目的编印的通书使用中文外,其他年鉴或年刊均以英文面貌出现,或为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服务,或供海关人员内部掌握使用,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很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梁廷枏《海国四说》、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等一批根据当时外国报刊和有关资料编纂而成的介绍西方的书籍,打开了国人眼界,但更具现实性和参考借鉴价值的年度性资料文献尚未进入近代知识分子视野。《列国岁计政要》译者郑昌棫曾感叹:“政事利弊、贫富众寡、强弱虚实,与夫目前切近情形,而未有其书以为依据,欲明其取舍,而覩由富而强之效,则甚难。”<sup>①</sup>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sup>②</sup>，“今中国事无大小,西人无不周知,而彼中情势,华人无能言其梗概者,何以覩国”<sup>③</sup>英国《政治家年鉴》的引进,就是洋务运动寻求“自强之道”的产物。

### 三、《列国岁计政要》的编译

1868年6月,在曾国藩等人的倡议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翻译馆“因制造而译书”<sup>④</sup>,出发点是翻译“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的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等类书籍,<sup>⑤</sup>人文社科类的书籍特别是反映各国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年度现状的年鉴类书籍,自然不是“紧要之务”。据“专办译书之事”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后来列出的书目清单,自1871年至1880年间,翻译馆已刊成之书98种,<sup>⑥</sup>社科类和新闻类书籍不过《四裔编年表》《西国近事汇编》《西事撮要》等屈指可数几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译、海盐郑昌棫笔述的《列国岁计政要》,即是其中之一。

《列国岁计政要》,六本,十二卷。“是书为英国麦丁富得力〔笔者注:即弗雷德里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按年编辑,由各国驻京公使领事钞录该国颁示之岁单,汇集而成,岁出一部,其月异而岁不同者,惟年款、官员迁调、船数、兵数、国债数、户口数,略有小异而

① 郑昌棫:《列国岁计政要》“序”,《富强斋丛书正全集》“史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小仓山房校印。

② 《同治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办理情形》,《洋务运动》(四),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79页。

③ 《直隶总督曾批》,《广方言馆全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④ 《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广方言馆全案》,第128页。

⑤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分册,《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⑥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

已,若朝代疆域章程,大概总不全更”<sup>①</sup>，“为同治十二年各国纪载”<sup>②</sup>。郑昌棫于“同治甲戌夏得是书,甚快”,谓“此书于为国之谟、安攘之道,裨益者广”<sup>③</sup>。该书选用的是1874年英国《政治家年鉴》最新版本。翻译采用当时通行的“口译笔述”译书方式,进行了“合于中国文法”的“改正润色”,<sup>④</sup>因此编译过后的“年鉴”呈现较为浓厚的中国色彩。第一,在书名对译上,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Statesman”和“Yearbook”两个英文词汇对当时的中国还很陌生,按照翻译馆约定俗成的译书原则,首先是沿用中文已有的名称,自古通行的“政要”“岁计”加上“列国”,自然成为最为贴切的对译词汇。第二,在内容体例上,虽然各国次序仍依原本按英文字母编次,但按照中国传统的编书习惯,原书的两大部分,拆分成了十二卷,其中卷一至卷六和卷八为“欧罗巴大洲”,卷七为“欧罗巴亚细亚洲”,卷九为“欧罗巴亚细亚洲、亚美利加洲”,卷十至卷十一为“亚美利加洲”,卷十二为“阿非利加大洲、亚细亚大洲”,原奥匈帝国、法国、德国、英国、俄国均独立成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人的地理观念和对列强的认识。第三,在素材翻译上,进行了许多处理。编译本删除了原书卷首的“世界大事记”,保留了原书卷首除“主要国家的银行”之外的大部分表格,只是在编排顺序和内容上进行了部分调整,原书关于信仰统计的表格排在了最后。收录的表格有9份:“中外各国比较民数地数表”“各国比较每方英里人民多寡表”“各国比较火轮车铁路匀算方里表”“各国比较电线路匀算方里表”“各国比较出洋轮船夹板船装载吨数表”“英国三十年中本国及别国通商船进出口吨数表”“英国比较七十二三年正月至九月进口货值若干磅表”“欧罗巴亚美利加各国比较国债钱粮并以钱粮抵还国债表数表”“欧罗巴各国比较教民表”。原书创刊之始,在亚洲部分就有专门章节连续介绍“中国”情况,1866年起又增加了“香港”的内容,记述中国的政府与税收,人口、贸易和工业,以及货币、度量衡等年度现状。编译后的《列国岁计政要》同样删除了1874年版中有关中国和香港的全部内容。《列国岁计政要》“例言”第一条特别说明:“我国家部例,外人罕闻,故其书独略而不详,今谨阙之。”<sup>⑤</sup>现存的制造局本目录卷十二“亚细亚洲”,在“锡兰岛”与“印度国”中间出现了一行空白,上部还有明显的涂黑痕迹。实际上,在英国《政治家年鉴》的原书中,用21页的篇幅(整个亚洲部分占32页)记述了中国的政体与政府、税收和人口、贸易和商业,尤其是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的介绍,对当时税收数据的引用,反映出当时的英国的确已经对中国有了较为宏观的认识。此外,书中提及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五个口岸,对这五个口岸进出口的物资、贸易额、增长率情况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可见当时西方将中国看作是一个蕴含巨大商机的区域。笔者推测,“略而不详”可能是《列国岁计政要》译述者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原书以西方政体的范式来表述中国政体,并且记述了有关在位皇帝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显明书意”,《列

① 《列国岁计政要》“例言”。

② 郑昌棫“序”,《列国岁计政要》。

③ 郑昌棫“序”,《列国岁计政要》。

④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18页。

⑤ 《列国岁计政要》“例言”。

国岁计政要》的口译者林乐知特地在书中补充了自己许多“论说”，这在当时和后来的西书中译中很少见。如卷五英国，笔者检索发现，林乐知的“论说”不下七八处，其中“英国议院”一节后评论道：“议院之权柄，内而朝廷，外而属地，无一不包举在内，国之定章，可增可减，可废可兴，教会、文武、钱粮、工商，远近巨细各务，非由议院核准，则不能行，以此国君垂拱于上，而政声翕然，此强国之本务也。”<sup>①</sup>

《列国岁计政要》的刊刻数量，目前缺乏具体文献记录。不过，据傅兰雅记载，当时翻译馆所译之书，“为官绅文士购存者多，又上海、厦门、烟台之公书院中亦各购存”，截至1879年6月，“计算所已销售之书有三万一千一百部，共计八万三千四百五十四本”<sup>②</sup>。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包括《列国岁计政要》在内的译书影响。1877年10月6日，《万国公报》从第458卷起，陆续选载该书部分内容。1881年，制造局将《列国岁计政要》等21种书籍，每种30部，共装8箱，呈送总理衙门。<sup>③</sup>《富强丛书》《军政丛书》《西学大成》和慎记书庄先后收录了该书。梁启超高度评价该书：“《列国岁计政要》，西士岁有著录，欲觐国势、察内政者，靡不宗此书。岁癸酉，制造局译出一通，齐州之士宝焉。”<sup>④</sup>担任过光绪皇帝英文侍读的晚清职业外交家张德彝充分肯定其编译成果：“《列国岁计政要》一书，详叙各国势利权衡，元元本本，殫见洽闻，亚洲各国者虽有错误之处，而欧美两洲者则条分缕析，强弱分明……其规模体例，有条而不紊，能令阅者一目了然。”<sup>⑤</sup>该书在晚清被普遍认为是“通今最要之书”，“讲求时事者必宜读之书”，“言西政者极要之书”，“询为政学家不可少之书”。薛福成《出使日记》、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王仁俊《格致古微》、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汤寿潜《危言》、缪荃孙《艺风堂日记》等，均提到该书。宣统年间，组织编译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的奉天提学使卢靖回忆道：“西国政家统计年鉴，岁有其书。靖二十年前读译本《列国岁计政要》而善之。”<sup>⑥</sup>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用书，主要委托傅兰雅向外国公司代为订购。但在已知的傅兰雅订购书籍、物品的清单上，未显示《列国岁计政要》的订购记录，熊月之认为“所据译本由英国驻华公使提供”<sup>⑦</sup>。傅兰雅在1869年6月3日的订购清单还显示当时订购的另外两部外国年鉴，一是向宾特瑞公司订购的《美国科学发现年鉴：1850到1868年》第19卷（*Annual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1850 to 1868 19 Vols*），二是向菲利普公司订购的由英国格林

① 《列国岁计政要》卷五，第7页。

②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21~23页。

③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413页。

④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1897年第33期，第3页。

⑤ 张德彝：《六述奇》（附七述奇未成稿）上册，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第271~272页。

⑥ 卢靖：《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奉天图书馆，1909年7月。

⑦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16页。按：熊先生此说资料来源不明，可能是受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英公使汇寄而成”一句话的影响，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威治天文台编纂的1870—1872年《英国航海年鉴》(*Nautical Almanac for 1870, 1871, 1872*)。<sup>①</sup>前者在有关翻译书目中均未见到,后者被引进后,由嗜好算学、精于数理、擅长推考天象的贾步纬,按照中国的习惯翻译为《航海通书》,于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刻出版,至1912年共连续刊印了43册,并运用于晚清军事和海上航行等领域。《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著录:“此书英国航海通书原本,西人航海度时表与通书相须为用,南汇贾文浩译成其述,年推一册,阐明理数,航海者宜人手一编。”<sup>②</sup>从原书书名和内容可以断定,《航海通书》是我国最早编译出版的一部西方天文类专业年鉴,而《列国岁计政要》则是我国近代编译出版的第一部国别类综合性年鉴,就其时间来看,较1909年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早30多年,两部年鉴的编译出版,共同开启了近代中国译介西方年鉴的先河。

有关《列国岁计政要》刊刻出版时间问题,一直没有较为准确的定义。傅兰雅1880年发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录刊书年岁为1878年,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徐勤等人称之为“癸酉列国岁计政要”,1909年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著录为“光绪元年制造局本”,<sup>③</sup>后来还有1874年、1876年、1880年等说。<sup>④</sup>贝奈特根据林乐知的记录、信件和日记整理的《1871—1881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图书目录》,在1874年项下的记录为“*The Statesman's Yearbook (see under 1876)*”,1876年项下的记录为“*The Statesman's Yearbook by [?] Martin, Lieh-kuo sui-chi cheng-yao 列国岁计政要 (with Cheng Ch'ang-yen 郑昌棧), 12 chüan*”<sup>⑤</sup>。根据当时译述者的记载,郑昌棧在光绪元年(1875年)秋八月《列国岁计政要》序言中提到“同治甲戌(1874年)夏得是书”,担任口译的林乐知1877年9月29日在其主持的《万国公报》第458卷中登载《列国岁计政要》宣传广告,称“前于公报已列告白,今已装订成功,特将是书之序文目录登诸公报,以公同好”<sup>⑥</sup>。据此可以推断,该书应该在1874年下半年组织编译,1875年底刊刻,装订成书的时间应该在1876年至1877年之间。“癸酉”(1873年)说可能是针对该书记述内容的截止时间而言。

#### 四、编译的继轨与延续

在《列国岁计政要》一书影响下,近代西方年鉴编译逐步形成热潮,至清末,以不同年

- ① [美]戴吉礼(Dagenais, F.)主编:《傅兰雅档案》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4~395页。
- ② 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一,1909年,第52页。
- ③ 傅兰雅的记述,被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及王娟《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等采用;光绪元年刊本,被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等采用。
- ④ 1874年说,如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等;1876年说,如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徐多毅、张勇刚《江南制造局人文社会科学译著底本的考证》,付晓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刻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1880年说,如赵少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晚清西史译介》等。
- ⑤ [美]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附录二”。
- ⑥ 《新出列国岁计政要书序并目录》,《万国公报》第10年第458卷,1877年9月29日。



份的英国《政治家年鉴》为蓝本编译的年鉴书籍或资料先后出现过四次,即:1897年《知新报》编译,1898年高凤谦编译,1898年驻英公使编译,1911年孙世昌编译。同时,以“列国岁计政要”为名展开的编译活动还有三次,即:1897年《丁酉列国岁计政要》、1902年《新译列国岁计政要》、1903年《癸卯列国岁计政要续编》。

1897年5月,刚刚在澳门创刊不久的维新派重要刊物《知新报》,“继前志,重译是书”<sup>①</sup>,由该报外文翻译周灵生将1896年“士咳咖路地”(笔者注:J. Scott Keltie,即司各特·开尔别,亦译为开尔梯或葛尔德)编辑的英国《政治家年鉴》重新译成中文,<sup>②</sup>附刊于该报每册之后。从1897年6月11日第24册起,到12月11日第42册,持续刊载了半年的时间,被称为《丁酉列国岁计政要》或《续译列国岁计政要》。与原书对比,译本对内容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原书分为不列颠帝国和其他国家两部分,第一部分单列出不列颠帝国及其附属国,第二部分其他国家不再用大洲做分类,而是直接从A到Z进行列举,更接近现在的排序方式。原书增加了4幅地图,分别为帕米尔高原的边境问题、中印边境问题、委内瑞拉—圭亚那边界问题、图解贝专纳兰<sup>③</sup>近期形势;卷首收录全球各国的面积和人口、全球红酒生产情况、全球的航运情况、全球的海军、不列颠帝国情况等5份总表。编译本无地图,目录分为九卷,一至三卷为民主国,四至六卷为君民共和国,七至九卷为君主国,收录了原书中“大清国”有关统治者、政府、面积和人口、须知、金融、军事、生产和工业、贸易、航运和航海、国家交流、货币和度量衡、外交使馆内容,编译凡例以“是书无总表”,故“卷首总表从本书撮译”。<sup>④</sup>《知新报》先后连载了“各国比较民数”等12种表格和美国、瑞士两个国家的内容,自42册之后中断。驻英国公使罗丰禄认为:“近日澳门刊行《知新报》,虽有重译之举,而每次只附数页,成帙无期,拭目难矣。”<sup>⑤</sup>从序言和连载内容判断,这是一部未译完的作品。1902年出版的《增版东西学书录》著录:“《知新报》印有英士咳咖路地辑、周逢源译《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六卷首一卷,未成。”<sup>⑥</sup>

进入戊戌年,英国《政治家年鉴》进一步引起朝野的重视。就在《知新报》连载《丁酉列国岁计政要》之后,曾在《时务报》上发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提出“政事之书所以较格致尤切”<sup>⑦</sup>的福建长乐人高凤谦(字梦旦),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萌发了拟购近年列国岁计之书,托人节译的想法,认为《知新报》所刻《列国岁计政要》一书,全用表体,林乐知所译列表甚少,新译之本似宜多列表,并且表达了对周灵生翻译该书的期待。<sup>⑧</sup>高凤谦意识到,“泰西易岁之交,必有一书,考究各国政要,即所称为列国岁计者也”。随即委托其兄

① 徐勤:《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知新报》(影印本),第24册,第219页。

②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第33册,1897年6月21日,第7~8页。

③ 博茨瓦纳共和国在1966年独立以前的旧称。

④ 《丁酉列国岁计政要例言》,《知新报》(影印本),第24册,第231页。

⑤ 张德彝:《六述奇》(附七述奇未成稿)上册,第272页。

⑥ 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30页。

⑦ 《时务报》第26册,1897年4月11日,第123页。

⑧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467~1470页。

高而谦(字子益)从巴黎邮寄1898年新出版的英国《政治家年鉴》,请当时与林纾同译《茶花女遗事》的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翻译。高凤谦“择其大者要者”,综合为《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在杭州印刷,托上海《时务报》代售。《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列国58个,分为京城、形势、国政、事权、君位、疆域方里、丁口、赋税银两、国债银两、人口货值银两、出口货值银两、铁路里数、电线里数、陆兵额数、兵船艘数、兵船吨数等19类,表中“有原书所缺者,间据他书补入”,“形势、国政、事权、君位及五洲疆域、丁口表,皆由他书采取”<sup>①</sup>。《西学富强丛书》在《列国岁计政要》之后收录该表。1900年3月31日起,《江南商务报》根据高凤谦整理的列国岁计政要图表,“择其尤要者,变其例为比较四表”,在第4期、第5期连载“列国岁计比较表”,包括“赋税国债比较”“进出口货比较”“疆域丁口比较”等4表,并说明“参而观之,列国盛衰强弱之势,略具于此矣”。<sup>②</sup>

与此同时,编译最新英国《政治家年鉴》的计划也在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酝酿实施,并成为戊戌新政的内容之一。1898年6月21日(五月初三),戊戌变法开始后,军机处专门给驻英公使罗丰禄发去电报:“英人所辑列国岁计政要,闻系每年一编,希查明,先将本年刊本,派员照译,以后仍按年译寄,译费准开报。”<sup>③</sup>罗丰禄即委派英文娴熟、有过多次周游世界经历的驻英参赞张德彝,“精通英国文字律例”“于列国情形了如指掌”的参赞罗叔羹,“中学淹贯,文理优长,四国周知”的随员林琴荪等4人总理译务,派学生魏谦、罗之彦管理誊录校对,武弁林文或管理绘图,购进1898年最新版年鉴,限三个月全书告成。罗丰禄了解到,“《列国岁计政要》一书,系英国地舆会书记葛尔德所辑,每年一编,扣至西历本年,业经刊行至第三十五次”,认为从前上海制造局译本,“中间人名地名随便译写,前后互异,毫无义例,识者病之,且所据英文原书,已系十数年前之老本,与列国现在情形尽成枘凿,不足以资考证……况恐前本译成,后本又出,在我方谓为新书,在人已弃为陈迹”<sup>④</sup>。此次由驻英公使组织的翻译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罗叔羹、林琴荪“口不停述,笔不停书,夜以继日”,试译数日,只能及半,感到“考究地名人,表式尤多费时。且译此与译报不同,须于简明详洽之中,照我华书体例而又不背原书”,“断非三个月所能成事”。于是,翻译计划进行了调整,罗丰禄除添派译员照原计划进行外,要求将关于英国、法国和俄国的432页内容先期翻译,限三个月以内全部完成。<sup>⑤</sup>此次翻译的原委和起始,张德彝在《六述奇》五月的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只是六月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及,编译工作可能因为时局变化而搁浅。

清末新政时期,“列国岁计政要”又出现两个版本,不过,与“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的思

① 高凤谦:《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凡例》,《富强斋丛书正全集》“史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初小仓山房校印。

② 江南商务沪局:《江南商务报》第4期,1900年3月1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案汇编》第25册《综合类·发电档》,《国外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④ 张德彝:《六述奇》(附七述奇未成稿)上册,第272页。

⑤ 张德彝:《六述奇》(附七述奇未成稿)上册,第276~277页。

潮相向,所据底本均来自日本。1901年义和团运动之后,“知识阶级皆知中国旧社会文化不足立国,求新知识之欲望甚大”<sup>①</sup>,留日学生大增。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的白作霖、傅运森、张相文三人合作编译《新译列国岁计政要》,6月编译成书,1902年4月由海上译社出版,排印本,十二册,刘树屏题签,张謇题写书名。“是书盖沿用其名(指江南制造局《列国岁计政要》),以别于旧作而曰‘新译’也”。<sup>②</sup>该书为日本太阳报的特刊,原名《世界国势要览》,日本博文馆刊行,底本由董懋堂从东京师范学校邮寄提供。《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卷首置“各国货币表”“中外度量衡合数表”“中日度量衡比较表”“中西东纪年表”,“例言”之后附“新译列国岁计政要释语”。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大清国”内容全部由编者采集。上编因“元书编次岁依字母为先后,而内国臣民难据兹例”<sup>③</sup>,特将“大清国”列于各国之首,然后分别介绍日本等亚细亚洲国家,中篇为欧罗巴洲,下篇为北亚美利加洲,各国政体、疆域、人口、农工、商兵、学校、财政、法律等,按国立表,按表分类。白作霖介绍,“郑译以五洲分列,属地海岛各以类从”,“兹编之例,则附庸虽大不书,有主权者虽小亦必录”<sup>④</sup>,“视制造局与新知报译本尤新而详”<sup>⑤</sup>。据译本保留的“原序”介绍,“编是书之意,在舍旧谋新,故所采取之书,多择其最近者,内如英国司投特门伊书,德国之花夫加仑大,与美国之千九百一年世界,皆有采录,虽臆造体例,贻消大方,然读者视为最新之年鉴,要亦未遑多让也”<sup>⑥</sup>。可见,原书是据当时英德美各国的统计年鉴和调查报告等书籍汇集而成。《新学书目提要》评价该书“孱辑成书,并非转译西籍”,但“译笔雅驯,例言允洽”。<sup>⑦</sup>《新闻报》刊登的《新译列国岁计政要书后》称,该书“译笔兼信达雅三长,与侯官严氏可分伯仲”<sup>⑧</sup>。《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出版后两月,即有书肆奸商割裂该书,涂抹字句,易名《最新万国政鉴》翻印,海上译社在《新闻报》等刊登“盗印新译列国岁计政要者阅”声明,并决定赅续是书。1903年,海上译社继续请白作霖、傅运森采择东西各国1902年各国统计书进行编译,年底,《癸卯列国岁计政要续编》成书,装订四册,版式大小仍旧。卷首收录的14份表格注明了资料来源,全书分为亚细亚洲、欧罗巴州、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亚非利加州五个部分,中国一门仍置于各国之前,由该社自己编辑,海上译社表示“以后当年出一编”。<sup>⑨</sup>

也就在《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出版后不久,正式以“年鉴”为名翻译的《最近五洲历史年鉴》出版。当时报纸记载,“是书为日本伊东佑毅所著,记述19世纪中五洲要事,提纲挈领,词简事备,后附万国统计表,专为政治家查考所必须”,每部大洋三角五分,寄售点有上

① 《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南园丛稿》第2辑,1935年,第9页。

② 沈兆祜编:《新学书目提要》卷一“法制类”,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390页。

③ 《新译列国岁计政要》“目录”,海上译社,1901年。

④ 《新译列国岁计政要》“例言”。

⑤ 《新译列国岁计政要预告》,《新闻报》1901年9月22日。

⑥ 《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原序”。

⑦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390页。

⑧ 《新闻报》,1902年5月18日。

⑨ 《癸卯列国岁计政要续编出书》,《新闻报》1903年8月22日。

海金粟译书处、普通学书室正记书庄、格致书室,代发行所为玉轴山房。<sup>①</sup> 相关研究显示,此书由徐鉴翻译,记载起于1800年,止于1900年,1902年4月由富文书局印刷,鉴今社发行。<sup>②</sup> 该书内容为百年大事记,类似于明末清初我国出现的《明四代年鉴》,与年度性记述不符,因此,《最近五洲历史年鉴》虽有现代年鉴之名,但还不能称之为我国编译的第一部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年鉴。1904年9月,《时报》刊发了一条上海昌明公司批发图书仪器的广告,其中列有“世界年鉴定价五元五角”。<sup>③</sup> 由于未见原书,推测很可能是编译当时日本的《世界年鉴》。1908年5月,《并州官报》开始连载有“并州官报馆译印”字样的“世界年鉴”,同年《直隶教育杂志》也连载有“世界年鉴”内容。根据《并州官报》和《直隶教育杂志》连载内容判断,所翻译连载的年鉴很可能是1908年伊东佑毅编辑出版的最新《世界年鉴》。也就是说,至迟到1904年,我国以“年鉴”为名编译的第一部现代年鉴已经正式出版发行,有资料可考的第一部以“年鉴”为名编译的现代年鉴出现时间应该是1908年,1909年谢荫昌辑译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还在其后。

清末最后一次编译英国《政治家年鉴》是在1911年。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员、安徽人孙世昌根据英国开尔别所编1910年英国《政治家年鉴》中的欧美教育统计资料辑译,定名为《千九百十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该书由奉天提学使、沔阳卢靖题署,宣统三年三月卢靖序。全书一册,设欧洲、美洲两编,上编包括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等22章,下编包括美国、加拿大、巴西等21章,书后有各章“汉英专名辞对照表”。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收录表格46个,其中上编40个、下编6个。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奉天图书印刷所印刷,三月初一日发行,定价大银元三角五分。

## 五、结 论

《列国岁计政要》问世140多年来,由于书名转译等原因,年鉴界始终未予关注。现代史学界尽管列出了底本,但对书籍内容和性质的解读却众说纷纭,或认为“此书形式类似于大事记”<sup>④</sup>,或认为“是早期出版的一本以介绍外国财政赋税制度为主的重要外国概况的史料集”<sup>⑤</sup>,或认为是“国际时局、新闻类”书籍,<sup>⑥</sup>还有人认为“是一种提供有关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概况的百科全书”<sup>⑦</sup>、“是一部介绍当时世界各国概况的手册”<sup>⑧</sup>,等等。

① 《新闻报》1902年8月3日。

② 潘喜颜:《清末历史译著研究(1901—1911)——以亚洲史传译著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 《时报》,1904年,第110号,第4页。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16页;上海科技学术文献出版社:《影印说明》,上海图书馆馆整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政史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册,第2页。

⑤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7页。

⑥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⑦ 徐多毅、张勇刚:《江南制造局人文社会科学译著底本的考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0期。

⑧ 王娟:《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清末《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称该书为“各国统计之书”的说法，也沿袭至今，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自西方引进的第一部统计类著作”<sup>①</sup>。对近代以来的年鉴编译，仅仅从翻译的中文书名去判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对原书的性质、类别缺乏深入了解，也会对译本的性质判断产生失误。《列国岁计政要》无疑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综合性年鉴，在近代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中国译介西方综合性年鉴的历史应当从1875年算起。

与同时代刊刻的其他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相比，《列国岁计政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助推了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列国岁计政要》的编译活动跨越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段，历经中西合译到自主译介、官方编译到朝野互动的演进过程。翻译时间之长、版本数量之多、持续关注度高，在近代西学传播史上是不多见的，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年鉴本身。正是该书富含的各国最新发展概况特别是对比统计资料，不仅让时人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世界形势，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在更深层面引发了知识界、思想界对求富求强、救亡图存的思考和关切。1877年，署名“百不如人”的作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介绍该书“足以观泰西富强之本”<sup>②</sup>。甲午之前，刚刚20岁出头、讲学于东莞的梁启超，在用于训示弟子的《读书分月课程》“学要十五则”中道出：“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sup>③</sup>。维新活动家徐勤通过《新译列国岁计政要》意识到，“不悉列国政治之得失、盛衰消长之迹，不足以言国政也”，“欲易新法，强中国，开民智，而为今日之急用者，则莫西政若矣”<sup>④</sup>。西方岁计政要之书，让追求变法图强的知识分子醒悟，“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可以自愧，可以自惕，可以自奋矣”。<sup>⑤</sup>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将《列国岁计政要》列入“西政诸书”，《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东西学书录》等列入“政治类”，《西学书目答问》列入“政治学”，可见其地位和影响。《列国岁计政要》的流播，还促进了维新变法人士对译书内容的反省，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统治阶层对译书轻重缓急认识的转变。御史杨深秀上奏：“同治时大学士曾国藩先识远见，开制造局，首译西书，而奉行不通本原，徒译兵学医学之书，而政治经济之本，乃不得一二，以是变法终不得其法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等“共同酌议”，计划将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大同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要求“所译之书，应先尽各国政治、法律、史传诸门，观其治乱兴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迹……徐及兵制、医学、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化电等项，以收实用”<sup>⑥</sup>。包括《列国岁计政要》在内的西方岁计政要之书的译介，在晚清社会变革中发挥出愈益重要的作用，正如1874年口译该书的林乐知在一封信中所预言的那

① 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

② 《新出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公报》，1877年7月21日。

③ 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页。

④ 徐勤：《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知新报》（影印本），第24册，第219页。

⑤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第33册，第8~9页。

⑥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摺》，1898年5月10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48页。

样,“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sup>①</sup>。

在后来国人对年鉴属性功能的认知方面,《列国岁计政要》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年鉴”在西方原本是一个多样化的宽泛概念,身为传教士的林乐知不可能对当时美国的传教类年鉴和其他流行年鉴毫无接触和了解。以“岁计政要”之名编译英国《政治家年鉴》,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同时身为新闻工作者、“关注社会批评和提供改革建议”<sup>②</sup>的林乐知“本土化”的取向。在近代中国面临深刻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吸引洋务派、维新派和新政时期时人对“年鉴”译介的重视,最主要一点,是年鉴最新统计资料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前后4次、延续30多年以“政要”为名的编译活动,在属性功能层面更加强化了“年鉴”的政治内涵。西方“年鉴”概念由此发生了“在地化”的转换,上升到资政、资治的“政书”位置。与此同时,受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刊载大量统计资料的“岁计政要”,因具有“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的功能,在清末与史学逐步挂钩,被纳入了史的范畴。梁启超从《列国岁计政要》统计资料中,萌发了“民史”的概念,称《列国岁计政要》为“国之良史”,提出“读一国史,不如读万国史”<sup>③</sup>,多年后所倡导的“历史统计学”更断言:“‘统计年鉴’之类的出版物,真算得绝好的现代社会史。”<sup>④</sup>唐才常在《史学论略》一文中,也表达了读《列国岁计政要》“通西史”的主张。<sup>⑤</sup>从清末“年鉴以统计为名,亦古史编年之一体”,“以研究国家之势力、人民之情状,察其消长进退之源,以为比较设施之准”的认识<sup>⑥</sup>,到民国初期对《世界年鉴》“悬之国门”“作千秋金鉴”的赞誉<sup>⑦</sup>,从“功同史乘,益比志书”的评价,到“今日各国之所谓年鉴,亦即史之属”,“吾人身观而亲历之最近史料”,“以供现代之研究而备后来之取鉴者也”等论断<sup>⑧</sup>,年鉴存史、资政的作用日益彰显,并贯穿于中国年鉴发展的始终。

1876年,日本统计寮根据1874年英国《政治家年鉴》,编译刊布《万国年鉴》,“以资政治之参观”。中国《列国岁计政要》与日本《万国年鉴》,所据底本相同,翻译目的相同,刊刻时间相同,两国年鉴发展却走上了不同道路。在这一点上,正好与近代两国转型的进程和路径相映衬,同时也给后人留下关于中国年鉴发展的更多思考。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① 转引自[美]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第69页。

② [美]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前言”。

③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第33册,第8~10页。

④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号。

⑤ 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第41页。

⑥ 《宪政编查馆奏请拟定民政财政统计表式酌举例要折》,《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5卷,第87~88页。

⑦ 赵秉钧:《世界年鉴“序”》,《世界年鉴(1913)》(1),《民国丛书续编》第1编第1册,第10页。

⑧ 参见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中国教育年鉴》等题词和序言。